

DE GUO

ZHENG ZHI JIAO YU YAN JIU

德国 政治教育研究

傅安洲 阮一帆 彭涛 著



人民出版社

德国政治教育研究

傅安洲 阮一帆 彭涛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崔继新

封扉设计:王芳芳

版式设计:程凤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政治教育研究/傅安洲,阮一帆,彭涛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4
ISBN 978-7-01-008767-2

I. 德… II. ①傅…②阮…③彭… III. 政治思想教育-研究-德国
IV. D75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9474 号

德国政治教育研究

DEGUO ZHENGZHI JIAOYU YANJIU

傅安洲 阮一帆 彭涛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2.5

字数:32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8767-2 定价:4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言

德意志民族在历史上一方面为世界文明做出过杰出贡献,另一方面又曾多次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但他们和日本不同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较为彻底地清算了纳粹统治的黑暗历史,深刻吸取了惨痛教训。究竟是什么原因?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作过深入研究,但从内因方面的研究还存在薄弱环节。以傅安洲为首的学术团队瞄准了这一薄弱环节,关注和系统研究德国如何通过构建国家政治教育体系来促进政治文化转型,从而必然地实现了内部的深刻变化。这样的研究无疑是重大的理论前沿课题。《德国政治教育研究》一书正是傅安洲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德国政治教育及其对当代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借鉴价值研究”的最终成果,全书共七章,26万多字。这一成果填补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一个空白,其特色和优点十分显著。

第一,该研究是全方位的。既有当代德国政治教育体系构建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文化境遇的历史研究,又有当代德国政治教育体系及其构建和发展历程的考证研究,更有当代德国政治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系统阐述,还从战后政治文化变迁的高度揭示了当代德国政治教育的功能和作用,最后落脚到对我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借鉴启示。可见,研究是全面、系统、深入的,只有解剖麻雀,才能做到知己知彼,对借鉴什么,如何借鉴,提出切实可行的中肯意见,达到比较研究的目的。

第二,分析深刻、透彻、科学。本书始终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尊重历史,对德意志民族国家每一次社会变革及政治秩序更迭导致的政治教育的概念、内涵、功能和形态的历史演变,都深入考证,客观叙述,深刻揭示了其本质。在对概念给予科学界定和辨析,对当代德国政治教育理论的思想渊源深入考察的基础上,对当代德国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从政治修养理

论、政治认知—参与理论和政治社会化理论三方面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阐述,从而能整体上呈现其理论特色和思想风格。通过对德国民众“二战史观”和“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及其价值观念的集体认同”如何形成的观测分析,有力地论证了德国政治教育体系在改变、创造、维系其政治文化、培养资产阶级民主社会公民中的功能及作用。可见,其研究达到了较高的理论深度,论证透彻。

第三,研究目的明确,既揭示规律,又科学借鉴。在比较政治教育研究中,揭示他国政治教育形成、发展和作用发挥的客观规律是科学借鉴的前提和基础,来不得半点含糊;而科学借鉴则是目的,是揭示规律的必然归宿和落脚点。既要反对对他国的一知半解,便将一鳞半爪的材料硬塞进自己前置结论的框框之中,又反对为比较而比较,目的不清,甚至只作单纯的别国情况介绍。本书没有这两个缺点,在对异中之同深入分析、揭示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切实可行的借鉴建议,从而也在比较研究中给同行树立了一个典范。

第四,资料翔实,成果丰硕。本书能做到结构完整,条理清晰,观点正确,论证充分,逻辑严谨,是与团队的治学严谨分不开的。他们虽也占有、研究了国内同行的相关研究成果,但更多地是收集、翻译、整理了德文、英文原版资料和网络资料。课题组成员多人多次去德国访学,且一去便是一年,十几年坚持这一研究风格。因此,不仅使本书做到了资料翔实,有理论有事实有数据,论据较充足,而且,指导的研究生和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也比较丰硕。

本成果能做到上面这些,是课题组成员严谨治学,艰苦奋斗,协同攻关的结果,据我所知,这与团队所在学校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长期抓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也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地质大学是具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点,他们不论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上,也不论在大学生社会实践、就业指导、心理咨询与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构建了党政群团齐抓共管、与用人单位长期协同配合的良性运行长效机制。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方面,既全面建设,又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上形成了鲜明特色。因此,同行们在分享他们丰硕研究成果的同时,还可以学习他们长期重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和重视学科建设的好经验。

在傅安洲、阮一帆、彭涛著《德国政治教育研究》即将面世之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大庆之日。作者们的成果既对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具有学术理论意义,又对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具有操作指导价值,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 60 周年国庆献上了一份厚礼,更是可喜可贺。本书的确是值得一读的一本好书,因此,我很乐意将此书推荐给大家。是为序。

张耀灿

于 2009 年国庆长假

前 言

一、研究的缘起

德意志民族是一个令世人难解的民族。有人说,德国人既是天使,又是魔鬼,并时而会出其不意地创造出奇迹。毋庸置疑,这个被称为“思想家和诗人的民族”,在为世界文明做出杰出贡献的同时,也曾多次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也使德意志民族自身命运多舛。自第二帝国(1871—1918)开始,德国人第一次经历了民族的统一、国力的强盛、民主(魏玛共和国)的洗礼,更背负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者和战败国的耻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①在战争的废墟上获得了新生。1949年建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从战争的劫难中得以迅速恢复并再度崛起,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在政治上建立起了西方式的民主共和体制,实现了政治与经济的同步发展。更重要的是,德意志民族较为彻底地清算了纳粹统治这段黑暗的历史,深刻吸取了历史的惨痛教训,改变了“麻烦制造者”的形象,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一支重要力量,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典范;经受了纳粹政治教化、具有根深蒂固“臣服权威”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德国人也经历了较彻底的思想解放,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系坚定的维护者。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曾经极力崇尚专制主义、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度和国民,为什么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的。毫无疑问,德意志民族历史性的变化脱离不了战后世界

^① 本书所指的德国,如无特别说明,均不包括1949—1990年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民主化浪潮的大背景,它是促成这一变化的外部环境。然而,外部环境并不会必然地带来内部的深刻变化,要实现这一变化尚需一些力量的推动和作用。我们所要关注和研究的是产生这一变化的政治文化因素,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政治文化(民众对政治体系和政治权力的认知、情感、认同)经历了怎样的变迁,重点关注和研究统治集团是如何通过构建其国家政治教育体系,促进政治文化的变迁和转型的,从而展示德国政治教育体系的构建过程,揭示其本质属性和功能作用。

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文化和具有民主思想、政治参与能力的公民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和民主国家的重要前提,政治体系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根本上源自民众的承认、认同和支持。当代德国政治教育作为统治集团政治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方式,是旨在促进公民政治认同,确立和巩固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性资源”,其功能在于形成民众政治认同的理性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政治教育以《基本法》的基本价值为依据,紧紧围绕着“确立公民的政治主体意识,强化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提高公民的政治宽容意识”,在促进民众对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政治权力和政治体制的“集体认同”,从而使政治体系取得“合法性”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也正是基于特殊的国情和民主政治体制建立发展的曲折历程,基于政治教育在改变、传承、创造政治文化的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议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政治教育,逐步构建了具有德国特色并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有典型意义的理论与实践体系。通过研究德国政治教育体系的构建发展与功能作用,揭示其本质和特点,对于我们加深对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和规律的认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思想和经验,具有特别的价值。

二、研究现状

在国外,德国政治教育研究的历史较早,并长期受到德、美、英、法等国学者和研究机构的重视。“联邦德国是欧洲少有的政治家、学者和其他专

家都普遍关注政治教育的国家。”^①在德国,政治教育是发展十分成熟、研究学者众多、研究成果极为丰硕的学术领域。自19世纪末期起至今,产生了一大批蜚声德国国内外的政治教育学者,代表人物有德国公民教育的先驱凯兴斯泰纳(Georg Kerschensteiner, 1854—1932),文化教育学派的杰出代表李特(Theodor Litt, 1880—1962)和斯普朗格(Eduard Spranger, 1882—1963);当代政治教育学者赫尔曼·基泽克(Hermann Giesecke, 1932—)、伯纳德·苏特(Bernhard Sutor, 1930—)、沃尔夫冈·希里根(Wolfgang Hilligen, 1916—2003)、瓦尔特·加格尔(Walter Gager, 1926—)、汉斯·京特·阿塞尔(Hans-Günther Assel, 1918—2002)等,他们的研究集中在政治教育基本原理、政治社会化理论、政治教育教学法、政治教育史等诸多方面。限于语言等因素,这些德国政治教育学家为数众多的文献著作尚未被译成中文,这是制约我国学者开展德国政治教育研究的主要障碍。

其他欧美国家也有大批研究德国政治教育的学者,主要代表人物如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约翰·帕特里克(John J. Patrick)教授、美国公民教育中心执行主席查尔斯·奎葛莱(Charles N. Quigley)、耶鲁大学的彼得·盖伊(Peter Gay)、英国的欧本海姆(A. N. Oppenheim)等。他们研究的重点包括德国政治教育与德国政治文化变迁、学校的民主教育、德国民众的政治认同与社会教育、青少年政治社会化、政治教育的全球化等。

我国学者对德国政治教育的研究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并随着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兴起而逐步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一是以王瑞荪主编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2001)、王玄武等著《比较德育学》(2000)为代表运用通观比较、专题比较、综合比较的方法对德国政治教育的某些要素如目标、方法、模式等进行了研究;二是以陈立思的《当代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1999)、苏崇德主编《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1995)、苏振芳主编《当代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比较》(2009)为代表,从国别研究的角度对德国政治教育的总体情况作了介绍和专题研究;三是以高峰著《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研究》(2005)、蓝维等著《公民教育:理论、历史与实践探索》(2007)、唐克

① Geoffrey K. Roberts. Political Education in Germany. Parliamentary Affairs, 2002, p556.

军著《比较公民教育》(2008)为代表,从公民教育的视角对德国政治教育进行研究。这些教材和专著,对德国政治教育进行了有价值的介绍和研究,但专门性研究成果尚付阙如。

我国台湾地区的德国政治教育研究起步较早,研究程度较高,当前成果集中体现在当代德国著名政治教育学者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史及学校政治教育课程改革等领域。如学者张淑媚关于赫尔曼·基泽克(Hermann Giesecke)“批判政治教育”思想的研究,詹栋梁的《斯普朗格文化教育思想及其影响》(1981)等。

本书作者所在研究团队,自1999年起,以德国实地调研为基础,依据大量德文文献,对德国政治教育进行了较为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初步梳理了德国政治教育的发展历史,分析了政治教育在政治文化变迁中的作用;描述了政治教育机构设置和管理体制演变的历程,揭示了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特征;开展了学校政治教育、成人政治教育研究。在《比较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德国研究》、《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等重要刊物上发表有关论文三十余篇,深化和丰富了国内对德国政治教育的研究。

三、本课题研究概况

德国特别是当代(1945—)德国政治教育体系的“构建发展和功能作用”是本书研究的重点。围绕这一重点,我们按照“历史研究—体系研究—理论研究—功能研究—借鉴研究”的基本路径,遵循“描述、解释、规范、比较”的技术路线开展研究工作。

第1—3章。历史研究。比较系统地梳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德国政治教育的历史演变,包括第二帝国(1871—1918)的“国民教育”(Staatbürgerliche Erziehung)、魏玛共和国(1919—1933)“基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教育”(Staat und Volk Bezugspunkte politische Bildung)、第三帝国(1933—1945)的“政治教化”(Politische Erziehung),阐述了当代德国政治教

育体系重启与构建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文化境遇。

第4章。体系研究。研究当代德国政治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在研究过程中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德国为何、怎样构建国家政治教育体系的?(2)在构建政治教育体系中遇到了哪些内部和外部挑战?是如何应对的?(3)国家政治教育体系有哪些重要构成要素?有何结构特征?(4)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怎样的政治教育思想?研究中我们特别选取“联邦政治教育中心”(Die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学校政治教育”和“政治教育理论”三个主要维度,对其历史演化进程进行观测,以揭示联邦德国政治教育体系构建和发展的历程。

第5章。理论研究。在历史研究和体系考证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并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当代德国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探讨当代德国民主政治教育体系背后的那些有形的各种力量和无形的、潜在的精神和文化的影响因素。本章对德国政治教育理论的思想渊源进行了追溯,对德国政治教育的概念进行了深入辨析,对政治修养理论、政治认知—参与理论和政治社会化理论三个当代德国政治教育基本理论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从整体上呈现了其理论特色和思想风格。

第6章。功能研究。从战后德国政治文化变迁的角度,说明当代德国政治教育体系的功能及作用。在“政治教育是政治文化学习和传播的基本途径和方式,也是政治体系能强力主导的、有效的政治文化学习和传播的途径和方式”的理论预设下,以德国民众的“二战史观”和“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及其价值观念的集体认同”为主要观测点,研究并阐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政治文化的变迁与转型,从而论证了德国政治教育体系在改变、创造、维持政治文化,培养资产阶级民主社会公民中发挥的作用。

第7章。借鉴研究。从思想认识、理论创新、实践操作三个层面概述了德国政治教育给我们的启示,并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当代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建议。

为了使研究工作能客观地反映德国政治教育的实际,使“描述”、“解释”、“规范”符合德国政治教育的本来面貌,克服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宏大叙事”、“主观联想”、“按照普遍的解释框架和所谓通用的概念进行

评价”的弊端,我们努力遵循“以原版文献为依据”、“以精确描述为方法”的原则,开展研究工作。同时,也十分注重吸收借鉴前人和同行在德国历史、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四、研究内容和主要成果

第一,德国政治教育(Politischer Bildung)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传统。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民众的政治教育。然而,如同德意志民族及其国家命运的跌宕起伏,德国政治教育也长期处在不断的分裂与重构之中。伴随每一次社会政治变革与政治秩序更迭,政治教育都被赋予不同的概念、内涵及功能,曾经历了君主专制的第二帝国时期的“国民教育”、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基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教育”、纳粹统治时期的“政治教化”,以及联邦共和国时期的“民主政治教育”等历史形态。

(1)从历史进程看,在封建君主专制时期,1662年颁布的著名的哥达校规(Gothaische Schulordnung),是德国建立大众化政治教育早期雏形的重要标志。自18世纪中叶以后,德意志邦国间由于领土、政治、经济全方位的竞争日趋激烈,统治者为了动员民众、凝聚民心、维护自身利益,开始重视政治教育。与此同时,教育科学的发展也推动了政治教育的发展。但是,由于德意志民族在政治上的分裂和各邦国政治经济上的不平衡,使得以培养“驯服的臣民”和争取德意志民族统一为目的的政治教育,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内容和功能上,都缺乏系统性,未能形成一项政治共同体层面的系统化、专门化的国民教育活动。

(2)1889年5月1日威廉二世(Wilhelm II, 1888—1918年在位)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鲁士教育工作的最高指示》的“敕令”和1890年柏林“学校工作会议”开幕辞,对德国系统化、专门化政治教育的发展具有发端意义。1871年德意志民族实现历史上第一次统一,建立了德意志第二帝国。1888年威廉二世登基。1889年5月1日威廉二世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鲁士教育工作的最高指示》的“敕令”和1890年柏林“学校工作会

议”开幕辞,被称为德国“国民教育的第一声起床号”。威廉二世的国民教育思想充斥着军国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封建专制主义和反社会民主主义的内容,同时也包含着一些积极主张,如开设专门的政治教育课程、学校要重视学生政治素质和实践技能培养、重视教学方式改革等。德皇的教育思想主导着第二帝国后期政治教育实践,对之后德国政治教育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德意志第二帝国政府对教育事业的全面掌管赋予了政治教育以国家意义,这使国家的教育制度能够满足帝国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使教育成为推广政治意识形态,传播政治文化的一种有效方式。

(3)魏玛共和国(1919—1933)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也是德国政治教育“制度化”的开端。为了培养民众对这个“生不逢时”的新生政权的认同,增强公民意识,《魏玛宪法》不仅确立了比较健全的民主政制,还规定了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和实施方式,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赋予政治教育最高的法律地位。依据宪法要求,政府还制订了政治教育纲领性的《指导原则》和实施《决议》,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政治教育制度和实施细则。同时,还成立了“公民教育委员会”等专门机构,负责制订政策和组织开展政治教育工作。至此建立了以“国家和民族”精神培养为首要任务,以“公民意识”养成为核心目标,以实行普及义务教育为主要形式的政治教育体系。与此同时,李特、施普朗格、凯兴斯泰纳的“国家观教育”、“公民教育”、“劳作教育”等教育思想,迎合了魏玛共和国的统治需要受到重视或被采纳,这些包含资产阶级民主进步观念的思想也为当代德国民主政治教育提供了理论指导。但是,由于魏玛共和国议会民主制是在没有完全摧毁封建专制主义基础的情况下建立的,只是承接了一个战败国政权,并没有改变第二帝国时期旧的经济结构和政权主体,在政治文化上延续了普鲁士专制主义、民族主义、军国主义传统,在政党结构上,形成了多党并立、互不妥协和分裂的政党体制,难以形成政治上的统一意志,最终被纳粹党利用,魏玛共和国的覆灭在所难免。而且当时文化悲观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反犹太民族主义盛行,这些文化思想也充斥着反共和国的倾向,在社会上营造了一种对昔日帝国强权政策的眷恋和反民主的氛围,在思想上把魏玛民众引向共和国的对立面。这样,刚刚建立的民主政治教育体系,也同短命的共和国一

起寿终正寝。当然,魏玛共和国政治教育的失败也有其内在的原因,这也曾是西方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德国学者库恩(Hans-Werner Kuhn)从政治教育制度、教师、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层面研究了其失败的原因,在西方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笔者另辟蹊径,从阶级根源、政治制度根源、政治文化根源以及政治教育内在的局限四个方面,分析了魏玛共和国政治教育失败的原因。

(4)1933年,希特勒的上台不仅是德国历史的转折点,同时也使德国教育彻底脱离了传统模式,德国政治教育也随之步入了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德意志第三帝国毁灭人性的、反动的“政治教化”,使德国政治教育的传统遭到严重破坏,其理论和实践几乎完全与西方的政治教育传统、魏玛时期德国政治教育的历史相决裂。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政治教育,在“反理性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领袖原则、军国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以服务于“种族纯洁和侵略扩张”为宗旨,以政治宣传灌输、建立纳粹政治教化机构、社会组织政治塑造、政治符号及象征的政治渲染为手段,将文化教育纳入政治化、国家化轨道,建立了反动的、非人性的“政治教化”体系,推动纳粹意识形态的传播,维护着纳粹独裁政权的统治。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政治教育,由于其反动的政治属性、扭曲的社会属性和异化的教育属性,以及对德国政治文化和民众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始终作为战后德国政治教育及政治文化建设的史鉴,并导致战后德国反思纳粹历史的曲折过程。

第二,当代德国政治教育,发端于占领国的“非纳粹化”和“再教育”运动,是在对纳粹政治教育深刻反思清算和对魏玛共和国政治教育扬弃与继承基础上的民主教育工作。

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在《基本法》中得以确立。政治权力和德国政治家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和历史使命,就是在缺乏民主政治文化传统的德国社会铲除纳粹思想遗毒,使德国民众从纳粹思想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树立正确的“二战史观”,并逐步接受、承认、支持新生的民主制度和政治体系。在联邦议会和政府的主导下,以《基本法》为依据,开展了持续、系统的政治教育工作,逐步建立了较完善的政治教育体系。该体系在促进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代德国政治教育体系的构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由初创到发展再到建立与完善若干阶段。我们根据德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政治教育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将当代德国政治教育体系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50年代政治教育体系的初步建立”、“60、70年代政治教育体系的发展”、“80年代以后政治教育体系的确立和完善”。鉴于德国政治教育体系要素和结构的复杂性与包容性,我们特别选取“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学校政治教育”和“政治教育理论流派”三个主要维度,对其构成和历史演化进行观测。其中,“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是联邦德国政府中主司政治教育的专门机构,是德国政治教育的决策、实施、组织和管理部門,体现着联邦议会和政府的意志,在德国政治教育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也是我们观测和解析德国政治教育体系的最具显示度的要素;学校是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和载体,也是德国政治教育最重要的实施机构,在其政治教育体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我们观测和解析德国政治教育体系的另一重要要素;政治教育理论及其流派是德国政治教育体系构建的依据,对政治教育实践起着指导作用。同时,我们也对不同阶段德国政治教育体系的其他构成要素如政治基金会、业余大学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进行了描述,力图作多方位的探讨。

(1)20世纪50年代,是联邦德国政治教育体系的初步建立时期。1952年,为了促进民众对新生的民主政权的接受与认同,“在德国人民中强化、传播民主和欧洲思想”,为德国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事业的复兴注入精神力量,以“联邦乡土服务中心”(Die Bundeszentrale für Heimatdienst,“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前身)的建立为标志,联邦德国议会和政府开始建构政治教育的国家体系。其中,“联邦乡土服务中心”的主要职能,一是通过出版发行政治性期刊(比较著名的是《议会》周刊)和手册开展宣传工作;二是为各级各类学校制定、编写政治教育教科书。在学校政治教育方面,德国文化部长联席会议(KMK)于1950年颁布的《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文化部长联席会议1950年6月15日决议》是联邦德国学校政治教育的奠基性文件。《决议》规定政治教育课程是所有联邦州学校的必修课,政治教育是全部教育的准则,要求在所有学科课程中贯彻实施。专门的政治教育课程以

共同体常识(Gemeinschaftskunde)、公民常识(Bürgerkunde)、当代常识(Gegenwartskunde)、政治(Politik)等为主,在内容上多强调政治结构、公民责任、社会合作等,而对青少年政治认知、政治人格的发展和政治参与技能的培养较为忽视。这既与50年代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背景(政治冷漠、社会隔阂)和美国实用主义社会科课程(Social Studies)教育思想有关,同时也受到以政治教育学家特奥多·威廉(Theodor Wilhelm)为代表人物的“合作教育”理论的影响。“合作教育”理论倡导构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社群与政府间的合作关系,注重社会规则、社会秩序、责任感、集体意识、合作精神的教育。“合作教育”在当时为帮助民众逐渐摆脱战争阴影,构建“合作”、“和谐”的社会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的看来,这一时期德国政治教育体系还处在比较松散的阶段。“联邦乡土服务中心”无论在机构设置、工作方式、教育内容以及对学校、社会政治教育工作的指导上都有较大不足,没有能充分调动社会资源来参与政治教育工作,尤为重要的是理论研究工作薄弱,使政治教育偏离了自身确立的目标轨道,致使教育效果不佳。学校政治教育,受“合作教育”理论影响较深,无论在课程设置还是教学内容上,多注重从国家、社会需要出发,强调公民的义务和责任。虽然“合作教育”理论切合当时德国社会政治的实际和民众政治心理的状况,但忽视对青少年民主思想的培育和政治参与能力的培养。这些弊端在60年代大规模社会冲突和青年运动中得以凸现。

(2)20世纪60、70年代,是德国政治教育体系的重要发展时期。60、70年代,德国面临一系列社会、政治危机,整个国家经历着“转型”的阵痛,社会矛盾集聚,青年运动频发。同时,自60年代起,联邦德国政府、社会开始全面深刻反思纳粹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外争取国际和解,对内巩固民主政制,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强化民主思想,增强民众合法有序地参与国家政治的意识和能力。这一时期,德国政治教育体系取得长足发展,从根本上奠定了当代德国政治教育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1963年,“联邦乡土服务中心”正式更名为“联邦政治教育中心”,从而更加明确了其工作职责——“通过在德国公民中实施政治教育促进对政治真相的理解,巩固民主意识并加强政治参与”。这也从方法论的角度回答了50年代“联邦乡土服务中心”

提出的历史任务,使得“在德国人民中强化、传播民主”成为可具体操作并取得较好效果的教育实践。那就是,通过发展公民的政治认知水平,使之形成自身的政治价值观,能够对社会政治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并采取正确的行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随着“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工作职能的专门化和系统化,不断扩大的机构设置所附着的政治教育职责的强化,其政治教育工作覆盖到社会各行各业,从学校到社会,从军队到地方,从国内到国外,都显示出其在德国政治教育体系中的影响力不断得到增强,它也由一个侧重宣传的机构发展成一个集宣传、教育培训、理论研究、对外交流于一身的政治教育国家机构。学校政治教育,一方面继承历史教育的传统以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二战史观”,同时突出政治课在学校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这是达到前述教育目标的必然选择。这一时期,也是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发展时期,以政治教育学家赫尔曼·基泽克(Hermann Giesecke)为代表的“冲突教育”理论流派和以伯纳德·苏特(Bernhard Sutor)为代表的“理性教育”理论流派,通过研究青少年政治认知发展规律和政治教育教学法,倡导通过发展政治认知能力,以获取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最终达到理性地参与社会政治的政治教育目的观,有力地指导了学校政治教育实践。

(3)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是德国政治教育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时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德国社会转型基本结束,民主政治文化普遍确立,民主价值观念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工业社会的弊端进一步显现,道德危机、生态危机、环境污染、核威胁等由于工业现代化和科技进步引发的社会问题日趋严重。这些“多元化”问题连同“民族统一”问题成为德国政治教育所面临的新课题。为此,“联邦政治教育中心”进一步扩展其工作职能和范围,它既为全社会供应丰富的政治教育公共产品,又为学校、社会机构的政治教育实践提供指导;它既与大众传媒机构密切协作,以加强舆论引导,又积极开发社会性政治教育资源,通过有效的社会化运作手段,引导、支持社会力量从事政治教育活动,形成了“国家主导与政府行政指导下社会组织普遍协同和广泛参与相结合”的政治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极大地促进了德国政治教育体系的确立和作用的发挥。在学校政治教育方面,为进一步指导各州中学政治教育教学,文化部长联席会议于1989年制订了政